

试析影响美国对台决策的若干基本因素

王伟男*

(上海社科院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上海 200020)

摘要: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与研究,认为美国在对台决策时主要考虑以下三个基本因素:第一,安全战略方面的需要;第二,维护美国的道义声望;第三,维护美国在台湾的经济文化利益。不同时期考虑的重点不同,对单个基本因素的重视程度也各异。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对台决策的考虑因素出现了复杂化趋势,这必将导致台湾问题产生出新的复杂性。

关键词: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安全战略;道义声望;经济文化

中图分类号:D8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07)01-0051-08

引言

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台政策经历过两次定型过程。第一次萌芽于1948年末中国两大政治集团——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殊死斗争的最终结局即将明朗之时,并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国民党集团败退台湾、朝鲜战争爆发等重大事件的发生而发展,最终经过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而定型。在整个60年代期间,与中美僵硬的双边关系相类似,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亦毫无进展,美国的对台政策也基本上一成不变。

第二次定型过程更准确地说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与再定型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1969年1月尼克松上台执政,其间经历基辛格与尼克松先后访华、尼克松辞职、福特与卡特先后继任、中美建交、里根当选、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去世、中国内政外交发生重大变动等事件,最后以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发表而告终。此后,美国的对台政策就基本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这四个文件来运作。^[1]

任何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时,都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取得合理平衡,从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美国对台政策的两次定型过程也不例外。同时,台湾问题又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特殊问题、核心问题。说它特殊,是因为在美国与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并不存在与它类似的、涉及其中一方领土主权的问题,它是中美关系所特有的一个问题。并且,这个问题还具有明显的国内、国际“双面性”特征。^[2]说它是核心问题,则是因为它作为中美关系的组成部分,不像两国之间的经贸、文化等关系那样是普通的一部分,而是与中美关系大局密切相关、能够左右整个双边关系基本面的一部分。“美国对华政策陷入长期困境,就是因为纠缠在包含各种复杂因素的棘手的台湾问题上”。^[3]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和重要性,使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美国在制定与调整对台政策时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从而为我们理解现行的、乃至前瞻未来的美国对台政策服务。

* 作者简介:王伟男,男,上海社科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实习生。

本文认为,美国在对台决策时主要考虑如下三个基本因素:第一,安全战略方面的需要;第二,维护美国的道义声望;第三,维护美国在台湾的经济文化利益。

一、安全战略方面的需要^[4]

这是台湾问题产生初期、乃至整个中美冷战期间美国制定对台政策时的首要考虑因素。对台政策要直接为对华遏制战略服务,而“大国关系的最核心部分,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是、也只能是军事或安全战略关系”。^[5]台湾因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而在周边大国的安全战略考量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处于联结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和大洋洲的关键节点上,是这些重要战略区域之间进行人员和物资往来的交通枢纽。它在安全战略方面的含义就是:一旦上述几个重要区域之间发生敌对关系,那么,谁控制了台湾及其毗邻岛屿,谁就能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反之,如果这几个重要区域之间处于友好、甚至结盟的状态,那么,台湾的战略地位就会大幅下降。

事实上,当国共两党在中国大陆的斗争结果日益明朗之时,美国对台湾战略重要性的判断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推论:未来控制中国大陆的政权对美是否“友好”?如果这个政权对美友好,那么台湾的战略地位就无足轻重;如果这个政权对美不友好、甚至敌对,那么台湾控制在谁的手里就事关重大了。1948年11月2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国务院的要求,对台湾及其毗邻岛屿对“美国安全的战略意义”进行了有文件可考的第一次评估,评估结果形成一份题为《福摩萨^[6]的战略重要性》、后来被编号为NSC 37的备忘录,作为对国务院咨询的答复。该备忘录基于上述推论,认为如果中国大陆被中国共产党所控制,而中国共产党政权又接受克里姆林宫的“影响”,美国将不仅不再能够利用中国大陆上的机场、港口、铁路等战略设施在东亚大陆同苏联对抗,而且中国本身也将对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构成重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作为战时基地对美国的潜在价值将迅速提升。

如果说,1948年末美国对台湾地缘战略重要性的评估只是基于“中共将取得中国政权并接受苏联的影响、台湾可能被中共政权所控制”这层层假设的话,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次年10月成立、特别是于1950年2月同苏联正式结盟后,在美国战略决策者看来,上述假设正一步步成为现实,台湾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也从评估、预测阶段转变为真真切切、触手可及的了。因此,尽管美国文职的外交政策决策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曾打算过放弃台湾,但受上述备忘录影响颇深的美国军方却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抗争。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1950年6月14日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信(即著名的“麦克阿瑟备忘录”)中,把可能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台湾比作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舰”。^[7]对台湾地理位置在美国地缘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的这种认识,成为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立即以实际行动改变对台政策的主要动因。^[8]随着中国出兵朝鲜并在战场上重创美军,美国战略决策者对台湾战略重要性的认识再次加深。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台湾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在许多战略文献里继续得到强调,成为美国制定对台政策时的首要考虑因素。这种重视体现在美国的对台政策上,便是对台湾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包括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派驻军事顾问团和作战部队,让第七舰队巡弋于台湾海峡。从美军进驻台海到中美关系解冻这段长达近20年的时间内,台湾也确实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例如,在越南战争期间,台湾成为美军在越南开展军事行动的重要战略基地,美国驻台军事人员的三分之二都与越战有关。^[9]众所周知,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初衷,便是阻止臆想中的中国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美国军事支持下的台湾当局还牵制着中国大陆部署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量兵力。另外,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台湾作为日本经济复兴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也是美国对日政策和东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50年代初台湾问题产生到整个60年代,在美国对台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台湾地理地位对美国安全

战略的重要性就成为压倒一切的考虑因素。这一时期中方在台湾问题上与美斗争的焦点，主要就是要求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必须全部撤出台海地区。

尼克松政府于1969年1月上台后，美国决策层逐渐把中国看作可以借重用来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而不再视其为主要敌人和遏制对象，美国对台决策要符合尼克松全球战略与对华政策调整的新需求，其逻辑结果便是，台湾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在其决策人眼中大幅下降。从已解密的1969~1973年间与台湾有关的尼克松政府外交文献来看，笔者尚未发现有任何一份正式讨论过台湾对美国安全战略的重要性，这与尼克松上任前的历届美国政府大不相同。正是在此背景下，尼克松于1969年10月以预算困难为由，暂停两艘驱逐舰在台湾海峡的例行巡逻，作为缓和对华关系的暗示。他对台军事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是在1970年5月废除由国会两党于1955年1月通过的“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10]在与中国的高级会谈中，基辛格和尼克松又先后向中方明确承诺从台海地区撤军的时间表。尽管这个时间表后来主要由于美国国内原因而未能按时实现，但这确实反映出台湾的战略地位在尼克松政府眼中已经大不如前了。相反，维护美国的声望与道义形象却一直是这个时期美国决策人念念不忘的主要考量。

二、维护美国的道义声望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道义声望考量也始自中美冷战之初。在两大阵营全面对抗、对中间地带激烈争夺的冷战背景下，作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并自诩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一直视自己在世界上、特别是盟友中的所谓声望为重要的无形的战略资产。在制定对台政策时，维护美国的道义形象与声望也是它优先考虑的因素之一。从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败局已定之日起，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一方面从现实主义出发，开始与国民党政权这艘“沉船”拉开距离，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打算从中国内战和台湾事务中脱身；另一方面又基于同国民党政权的历史联系和道义考量，并没有完全抛弃它，仍然向它提供具有象征意义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些援助很快就恢复到具有实质意义的程度。此后，美国决策者在强调台湾战略重要性的同时，还不忘对失去台湾及国民党集团占据的沿海岛屿可能对美国声望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评估。例如，1954年9月4日，美国情报部门提出一份题为“某些中国大陆沿海岛屿面临的形势”的“国家情报特别评估报告”。该报告指出：

..... [沿海岛屿的失守] 对国民党政府的负面影响会大大增加，美国在整个远东的威信也会遭到严重打击。日本可能会重新评估它同美国的联盟，东南亚非共产党国家也会对美国履行对该地区防御承诺的意愿和能力表示严重怀疑。^[11]

1954年12月，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意味着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保证以条约义务的形式规定下来，也意味着美国为维护自己在远东地区的声望而不惜投下更大的赌注，台湾的安全战略地位与美国在远东乃至整个“自由世界”的声望更加紧密、直接地联系起来。1955年5月1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巴黎召开的“北大西洋理事会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向其西方盟国解释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原因时，为了更有说服力，居然把对蒋政权的道义考量排到了安全战略考量的前面。他说：

在福摩萨，美国已与之缔结互助条约，其基本原因有两个： 中华民国是上一场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笔者注）中先我们之前就与我们的敌人进行战斗的忠实盟友。我们认为忠诚于盟友不是一种过错，即使这个盟友在困难时刻会失败。这在以前曾经发生过，当时中国国民党把首都迁到了重庆。福摩萨在从阿留申群岛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沿海岛屿和半岛所构成的链条中占有重要地位.....^[12]

杜勒斯把美国为了自身战略利益而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并利用台湾遏制新中国的客观事实，粉饰为美国

“忠诚于盟友”的卫道士形象，虽然有点本末倒置，但美国决策层在台湾问题上对道义声望的考量和重视程度却可见一斑。

到了 70 年代，当尼克松政府决心实现与中国的缓和、并试图联华抗苏后，台湾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大幅下降，维护美国的道义形象和声望却上升为美国对台决策时的主导性考虑因素。1971 年 7 月 1 日，就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尼克松在白宫对基辛格面授机宜。他特别向基辛格强调，“与中国人进行的会谈不能看上去像是在出卖台湾”。^[13]1971 年 8 月 14 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后一个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艾伯特专程赴台，向台湾当局当面重申尼克松关于美国不会抛弃“老朋友”的保证：“我想对我们的政策作最清楚的说明：我们谋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的关系，不会以牺牲我们老朋友的利益为代价。”^[14]基辛格也在一份关于“中国政策”的背景材料中写道：

我们遵守条约所规定的对我们的亚洲盟国、特别是值得我们珍视的盟国和朋友——中华民国——的安全义务。……全世界都知道，为了保留中华民国的席位，我们在联合国战斗得很辛苦，因为我们认为，中华民国资格作为国际社会一个遵纪守法的成员。对我们而言，这是为了维护我们的荣誉而必须做的事；同时我们认为，对联合国而言，这也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对最后的结果深感失望，但这决不会影响到我们与中华民国的结盟义务和友谊。^[15]

在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期间，他们一再向中方强调“不能轻易抛弃老朋友”，不想“出卖台湾当局”，并“非常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特别是，不想马上按照中方提出的要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其主要考量，就是担心在台湾的安全得不到切实保障的情况下就将其抛弃，会使美国在其盟国中和整个世界的声誉受到削弱。《上海公报》发表后，尼克松政府确实按照它所承诺的时间表开始从台湾逐步撤军，但与此同时，它也加大了对台湾当局的武器供应力度。此举既出于对台湾自身安全的考虑，更出于安抚台湾当局——这两者都主要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声望。中美在建交过程中的艰苦谈判、《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及美国坚持售台武器，其主要考量也在于此。里根政府上台初期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也夹杂着里根本人狂热的反共意识形态因素。

因此，在美国对台政策第一次定型过程和整个 60 年代期间，对台湾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的考虑，居于压倒一切的地位，同时维护美国的道义形象与声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尼克松政府决定对对台政策进行调整及此后对台政策的再定型过程中，维护美国的道义声望就上升为主导性考量。从新中国成立到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这种考量主要体现在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军事保护和政治支持上，在其对台政策的第二次定型过程中则主要体现在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强烈“关注”上。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这种考量就主要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和美国对台军售来体现了。

三、经济与文化利益

蒋介石集团迁台初期，少量的象征性美援跟着到来。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后，美国对台湾当局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力度迅速加大，美国的经济势力全面进入台湾。因为美国决策者知道，稳定台湾必须首先稳定台湾的经济，而“该岛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做法”。^[16]他们还注意到，“在过去 50 年左右的时间里，福摩萨一直是日本的一部分，其经济与日本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日本和福摩萨之间现在仍然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应考虑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维持日本和福摩萨之间自由贸易的可行性，这无疑符合双方的利益”。^[17]这说明，美国最初的对台经济考量是被置于美国的远东战略考虑之中的。

朝鲜战争结束后，台湾经济开始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经济援助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台湾经济发展和日后起飞的主要资金来源。在台湾当局的历次经济建设计划中，美援均占重要地位；

凡规模较大、需要资金较多的建设项目，均有美援资助。美援涉及电力、水利、交通运输、农业、制造业等领域，还包括技术援助和人员培训。从 1955 财政年度到 1965 年 6 月底，美国对台经济援助额为 11 亿 680 万美元，若加上 1951~1954 年的援助额，总量达到 14 亿 8200 万美元。1965 年 6 月 30 日美援停止，此后，除有限数量的剩余农产品外，美国没有再给台湾以经济援助。^[18]

然而，美国停止对台经济援助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势力从台湾全面撤退出来；相反，先前的经济援助已经使台湾成为美国的理想投资场所与商品销售市场，从而使美国的经济利益更深地扎根于台湾。例如，在对台商品输出方面，美国西部和南部的煤、大豆、棉花、烟草、机电设备等都是大宗商品。1978 年，美台贸易额为 75 亿美元，台湾以其区区 2000 万人口和 3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却是美国排名第八的贸易伙伴。此外，台湾在美台贸易中所得的美元盈余大多都以外汇储备形式存放在驻台的美国银行中，这对维持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也具有重要意义。^[19]

随着美国军事人员和设施逐步从台湾撤离出来，美台之间的武器贸易也在美台贸易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前，美台之间的单宗武器交易就动辄上千万美元。《八一七公报》事实上并没有阻止住美国对台军售增长的势头，甚至还变本加厉。例如，1982 年 11 月，美国政府表示将向台湾出售价值总额约为 9700 万美元的装甲车辆。1983 年 7 月，美国宣布将向台湾出售 5.3 亿美元的武器。1986 年 8 月，美国国防部通知国会，它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 2.6 亿美元的新装备。^[20]如此规模的美台武器交易，必然使美国军工企业的经济利益同台湾的经济与安全状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美建交后美国政府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既出于保证台湾安全、从而维护美国声望的主要考量，也在很大程度与美国军工企业的鼎力支持有关。

因此，在美国对台政策的第一次形成过程中，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只处于从属地位，它服务于安全战略方面的需求，并用来维持美国对台湾当局的道义支持。在尼克松政府的对台政策调整和其后的再定型过程中，随着美国对台军事支持的主要形式由驻军逐渐转向军售，经济利益作为相对独立的考虑因素开始显现。到中美建交以后，经济因素既体现在美国对台巨额投资和美台之间的普通商品贸易上，也体现在美国对台日益增长的武器销售上。特别是美台武器贸易，正是它把美国对安全战略、道义声望、经济利益这三种考虑因素复杂地纠合在一起，成为日后中美关系摩擦不断的重要根源。

美国在台湾的文化利益，主要表现为美国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制度安排等意识形态层次的文化力量以及教育、语言、传媒、娱乐、饮食、习俗等日常生活层次的文化力量，对台湾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影响。美国人一直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制度都是世界上优秀的制度。而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源起于美国的“民主和平论”，则直接为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推广美式民主和生活方式提供了理论基础。^[21]在这种情况下，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岛内民众及美国的压力下努力向民主化方向迈进的台湾，其民主化实践的成败，自然会被美国战略精英视为美国价值观的成败。而且，与道义声望、经济利益一样，美国在台湾的文化利益也有服务于其安全战略的一面。

四、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调整走向

在冷战后美国的对台政策调整中，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仍是那三项：安全战略方面的需要、美国的道义声望、美国在台湾的经济文化利益，但它们的优先次序和受到重视的程度却再次发生变化。由于美国主流战略精英不再视中国为地缘政治上的友好国家，而是把它当作美国未来的战略竞争者和独霸地位的潜在挑战者，那么，未来对付这个潜在挑战者所需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和准入权（access）就被纳入到美国战略决策者的视野中，而台湾作为中美冷战时期美国用以遏制中国的战略利器，对美国安全战略重要性的考量在冷

战后美国的对台决策中必然重新成为首要因素。这种调整体现在具体的政策上，便是冷战后美台实质军事关系的大幅提升。

1996年3月台海危机期间，美国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公然到台海附近进行威慑，不禁让人想起中美冷战岁月里、特别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军舰所扮演的角色。2001年上半年，刚刚入主白宫的共和党人小布什总统两次扬言，一旦中国武力“犯台”，美国将尽其所能“协防”台湾。^[22]稍后发生的“9·11事件”使布什政府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到反恐上来，并由于顾及中国在国际反恐中的重要作用而在对台政策上有所收敛，甚至还在最近抛出“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者’”之新说。但与此同时，美台之间的实质性军事关系却继续得到提升。2004年3月6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美国在提升C4ISR系统、导弹防御和反潜作战能力方面，正“积极与台湾合作”。该报道还说，除以上三个方面外，美国还协助强化台军在人事、后勤、维修、训练和战略规划等方面的能力。美国还建议台湾强化协同作战能力，“包括国军各军种间、台湾与美国间以及台湾与其他可能的安全伙伴间”的协同作战能力。该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匿名官员的话说，“美国和台湾有着共同的战略等利益，不因执政党派与个人不同而有差别”。^[23]2004年6月，在美国的暗中推动下，台湾行政当局提出为期15年的6200亿新台币跨年度“特别预算案”，用于向美国采购军火。^[24]另据权威防务杂志《简氏防务周刊》2004年12月20日报道，美国将从2005年起派驻现役军官到美国驻台机构，若属实，将是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首次有现役美军进驻台湾。^[25]而美日之间由外交和国防部门长官组成的“安全磋商委员会”（即所谓的“2+2”会议）于2005年2月19日发表的共同声明，首次将台湾问题列为两国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并“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则是二者联手干预台湾问题的重要信号，为动荡不宁的台海局势注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26]以上事态都表明了美国对台政策相对于1970~1980年代的重大逆转，美国对台决策中的安全战略考量带有向中美冷战时期回归的明显趋势。

然而，任何历史场景的重现都不可能是简单的重复。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下，美国对台决策中的安全战略考量，也不可能是对上个世纪50、60年代中美冷战时期它对台决策模式的简单复制。首先，今天的中国已不是当年的中国。相对于当年基本处于孤立、封闭状态下的红色国度，今天的中国在整个国际体系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与整体形象已远远超过当年。它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联系的紧密程度更是当年难以比拟。其次，与中国实力地位发生的巨大变化相联系，中国在东亚地区及至全球事务上的发言权获得了空前扩大，美国在许多涉及到地区和国际安全的重大事务上，都需要中国的配合与合作。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的最新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三，上述两大变化预示着，尽管美国在对台决策上重新提升台湾在安全战略上的重大意义，但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来看，中国崛起的客观现实及其造成的重大影响，却是需要美国更加重视的全局性考量因素。这就意味着，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将更加难以按照自己的理想设计——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让台湾“和平独立”——来运作。这表现在近年来美国对台湾民进党当局愈来愈严厉的“管束”上，也表现在中美双方对“共管”台海现状愈来愈明显的战略默契上。

在维护美国的道义声望方面，除了继续高度关注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外，由于90年代以来台湾在政治与社会体制方面更加接近美国，一些美国政治精英把台湾视为东亚地区的“民主橱窗”、以美国为首的“民主社团”之一员。在他们看来，大陆的“专制政权”欺负台湾的“民主政体”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从而在对台决策时美国背上了更加沉重的道义声望包袱。所以，与中美冷战期间相比，道义声望考虑明显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而2005年1月20日布什在其连任就职演说中的一番慷慨陈词，为此做了清晰的注脚。他说：

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并支持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民主运动，寻求并支持民主的制度化，最终的目标是终结世间的任何极权制度。^[27]

当前，美台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比中美建交时广泛得多、深入得多。美国出于安全战略、道义声望考虑而加大对台军售力度，在客观上也进一步增进了美国在台湾的经济利益。而近年来台湾在民主实践方面的

“成功经验”，也成为美国炫耀并利用美式民主推行它的全球战略的重要砝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大背景下，经济文化利益和道义声望在某种程度上还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安全战略图谋起着掩盖和粉饰的作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美苏冷战结束后迄今，在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中，安全战略方面的考量再次占据主导地位，对道义声望与经济文化利益的重视程度也得到大幅提升。后两者自身既有了更大的独立性，也增强了服务于前者的功能，这必将导致台湾问题产生出新的复杂性。在中美出现潜在战略竞争与地缘对抗的情况下，台湾问题必然重新成为这种竞争与对抗的重要一环。除非全球战略格局再次发生类似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有利于中国的重大演变，否则，上述三项考虑因素在美国对台决策中的分布态势将长期存在下去。然而，正是由于冷战后以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全球战略格局确实有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的因子和趋势。这种因子和趋势无论对中美关系还是台湾问题，都将进一步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 [1] 例如，据中新社华盛顿 2005 年 3 月 14 日电，在当天美国国务院的例行吹风会上，当发言人包润石被问及中国施行《反分裂国家法》是否会影响中美关系时，包润石称，美国的政策以“一个中国”原则、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为指导，美国将继续履行这些义务。实际上这也是美国官方长期以来多次重复的、一贯的说法，尽管《与台湾关系法》与三个联合公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原则性冲突。
- [2] 关于台湾问题的“双面性”特征，毛泽东在 1959 年 10 月同巴西等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曾有明确阐述，谈话原文可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89-90 页。
- [3] 袁明、[美] 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465 页。
- [4] 关于由台湾的地理位置引发的地缘战略意义，笔者曾有拙作进行专门论述，可参见王伟男、周建明：《地缘政治中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载于《台湾研究集刊》2005 年第 4 期，本节内容即主要来自该文。因此，本节只作简要说明，特别是略去了对部分原始文献的引用。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该文。
- [5] 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 - 1972）》，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年，引言第 页。
- [6] 即台湾岛，英文为 Formosa，是荷兰殖民者统治台湾时对它的称呼。英美的官方文献中在涉及台湾时长期使用该名称。
- [7]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二卷（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 39 - 42 页。
- [8] 对这个观点的详细论证，可参见林利民：《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年，第 3 章。
- [9] 基辛格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备忘录，1971 年 7 月 9 日，下午 4 点 35 分至晚上 11 点 20 分，中国国宾馆。资料来源：NSC files, Box 1033, China HAK Memcons July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
- [10] 该决议规定，美国总统有权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以确保台湾和澎湖列岛不受武装进攻。决议原文可参见：美国《国务院公报》1955 年 2 月 7 日，第 213 页，转引自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二卷（上），第 438 页。
- [11][12]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二卷（上），第 243 - 244 页、第 899 - 900 页。
- [13] 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和黑格将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议记录，1971 年 7 月 1 日（星期四）。资料来源：NSC Files, Box 1036, "China-General July-October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
- [14]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2 页。
- [15] 基辛格关于“中国政策”的背景材料，1971 年 8 月。资料来源：NSC files, HAK Personal and Office Files/China,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国第二国家档案馆。
- [16][17]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二卷（上），第 59 页，第 65 页。

- [18] 茅家琦：《台湾三十年（1949 - 197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3页。
- [19] 周忠菲：《中美建交中的台湾问题》，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39页。
- [20] 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1979-1994）》，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 - 23页。
- [21] “民主和平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切尔·多伊利。他在1983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民主国家之间很难发生战争，原因是它们国内的民主机制会及时制止非理性的战争冲动。具体可参见倪世雄主编：《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49 - 451页。
- [22] “小布什要‘尽其所能帮助台湾自卫’”，华夏经纬网：<http://www.huaxia.com/2003617/00003190.html>。
- [23] “美官员：不论谁当选与台军事关系依旧”，2004年3月8日《参考资料》，转引自3月6日台湾《中国时报》。其中提到的C4ISR是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computer、intelligence、surveillance和reconnaissance七个英文单词的简写。C4ISR系统的实质是把包括众多计算机在内的各种信息获取、处理、控制、传输等设备联为一体，成为现代军队的“神经中枢”。美台在C4ISR系统上的合作意味着：一旦台海战火燃起，美军可能通过C4ISR系统直接指挥台军作战。
- [24] 在台湾岛内政党博弈等因素的影响下，该预算案的总额被一减再减，至今尚未通过。但这丝毫不能改变美国军事战略界主流人士和岛内台独势力的战略意图，台海局势自2006年元月以来的新发展、特别是美国最近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战略动向就说明了这一点。
- [25] “美国将派现役军官驻台湾”，TOM网：<http://news.tom.com/1003/3295/20041220-1667583.html>。
- [26] “美日再次发出错误信号，台海局势更趋复杂”，《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3月3日第3版。颇为耐人寻味的是，近年来美日两国还分别多次向欧盟表达它们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销售禁令的“愿望”，其目的，据说也是为了“维护台海和平”。
- [27] “布什第二任就职演讲全文”，中南民族大学网站资源：<http://news.scuec.edu.cn/bbs/index.php?showtopic=3077>。

Analysis of Several Fundamental Elements Affecting U.S. Policy-decision toward Taiwan

WANG Wei-nan

Abstract: By reviewing and studying correlative history, the author deduces in this paper that there have been three fundamental elements affecting U.S. Policy-decision toward Taiwan since this issue came into being. The three elements are the need of security strategy, the image of U.S. morality & prestige, and its economic & cultural interests in Taiwan, respectively. The emphases and extents of emphasizing have been differing at different times. Since the end of Cold War, China has been on a fast trip of rising and the elements affecting U.S. policy-decision toward Taiwan have taken on a trend of complicating, which will necessarily result in new complexity for Taiwan Issue.

Key words: Sino-U.S. relations, Taiwan Issue, Security strategy, Morality & Prestige, Economy & Culture